

智慧之光穿越千年

全译四大智书

夏威夷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明 何 愚 编撰 马 健 宋 安 郑 小 宁 校订

经世奇谋



智慧之光穿越千年

全译四大智书 夏咸淳 主编

经世奇谋

[明] 俞 琳 编撰
马镛 朱奕 郑小宁 校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译四大智书:经世奇谋/(明)俞琳编撰.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3(重印)
ISBN 7-5348-1622-X

I. 全… II. 俞… III. 谋略-中国-古代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337 号

全译四大智书

夏咸淳 主编

经世奇谋

(附《智谋名臣传》)

[明]俞琳 编撰

马 镛 朱 奕 郑小宁 校译

责任编辑 赵新民

责任校对 岱 宁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25 印张 684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 201—5 270 册

ISBN 7-5348-1622-X/G·314

定价:39.00 元

智慧之光穿越千年

——《全译四大智书》前言

夏咸淳

拂去历史的尘封

明代万历以来,思想文化极富创造性,才士巨匠、奇书杰构层出不穷,展现出一幅新丽瑰奇的图景。《智囊》诸书的陆续问世,正是这一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奇观。

《智囊》这一类书的内容是讲述古往今来的智慧故事,材料取自各种正史、稗乘、笔记和传说,编撰方法大都节录现成材料,略加改编,分门别类,并附有评语。《四库全书总目》列其书于子部“杂家类”,如果列入史部中“史抄类”、“传记类”或“杂史类”,似乎更为恰当。笔者统称之为“智书”,乃出于杜撰。

晚明智书主要有以下几种:

《智品》。樊玉衡编撰,於伦补辑,13卷,刊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误作樊玉衡撰,不知玉衡乃玉衡之兄。玉衡有弟曰玉衡,字升之,《智品》校阅者、批评者。樊氏昆仲并为湖北黄冈名士。

《益智编》。孙能传编撰,41卷,与《智品》同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经世奇谋》。俞琳编撰,8卷,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库全书总目》无著录。

《智囊》。冯梦龙编撰,28卷,刊于天启六年(1626)。崇祯七年(1634)再版,略有增补,更名《智囊补》,别本亦作《智囊全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在《智品》与《益智编》问世前的15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已有李贽《藏书》行世。这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识史裁皆悖于传统观念,分门别类也标新立异,特辟“智谋名臣”,是专为历代智者谋士立传的。其例实为史家之创体,智书之肇始。李贽对晚明学者文人的影响很大,焦竑《藏书序》称其“声名赫赫赢海内”,“学者复耳熟于先生之书”(指《藏书》),“且以为衡鉴,且以为著龟”。樊玉衡等人一定是受到《藏书》的启发,从中汲其史鉴与史法,专注于智慧一门,博采古今智者事迹,编成专书。所收人物也由智谋大臣扩展到一切智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乃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凡属智者,皆予收录。这比李贽的《藏书》又进了一大步,更加突出智慧的地位。这类专书在万历以前未曾得见,盖为晚明学者独创。其中《智囊》最晚出(与《智品》、《益智编》刊出时间相隔也仅12年),而规模最大,评语最多,思想博大精深,堪称集智书之大成。清初易代之际,文史奇才张岱仰承晚明流风余韵,于康熙十九年(1680)编成《琅嬛乞巧录》一书,专收明人用智之事,因家贫未付铅槧,现存手稿一册,已成鲜为人知的孤本秘笈了。

《智囊》诸书蕴含深广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宗旨的严肃性,思想的深刻性,形式的生动性,兼而有之。内容丰富新奇,贴近现实生活,又有警策活泼的评语指点眉眼精神,字里行间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以古鉴今,益人神智。作者与评者真正把历史读活了,而且能顾及读者的心理,讲究知识性、趣味性,使雅俗共赏。所以其书在明季深受时人欢迎,流布颇广。冯梦龙在《智囊补自叙》中曾谈到《智囊》的社会反响,说此书刚刚面世即获“海内明哲”嘉许,吸引倾倒了很多读者,不久书市告罄,“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但是人

清以后,明代智书渐趋湮没,流传越来越少。《经世奇谋》传本同样稀少。《智囊》也要到近世才出现各种改头换面的翻刻本,印刷质量和纸质都很差,这是书商为迎合近代市民口味而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有清 300 年,并未见到能够追踪明代智书作者,另创新篇的人。智书的衰歇同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有密切关系。清儒大率以儒家正统自居,以复兴古学自命,推崇考据之学,鄙弃术智之事,对明代特别是晚明学术每持偏见,将那些新鲜活泼、离经叛道的思想学说看作异端邪说,不屑一顾,竭力排抵。对晚明智书评价也是如此,以为纯属小道不经之谈,卑不足道。其谓《智品》“尤乖刺矣”,谓《益智编》“其书不足据”,谓《智囊》“佻薄殊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抓住考证上的某些疏漏,便将其书一笔抹煞。清儒的这些学术批评如同一层厚厚的芜草尘垢覆盖了明代智书的真价值,遂使宝笈精光沉埋 300 年之久,乃至影响今人的解读和评价。

现在,《智囊》已被不断翻印,毛泽东《智囊》评点本也于最近出版发行,奇书精光渐渐透露。前不久,《经世奇谋》也出版了,却毫无反响。《智品》、《益智编》等书依旧沉睡书库,很少有人一披其面。值得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是,这几部书产生于同一时期,决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丰富而极有价值的思想新质,潜伏着一股活泼蔚盛的崇智潮流。本文试图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潮以及历史上关于智慧的各种见解,对晚明智书作综合的历史的考察,研求其学术要旨和思想特色以及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如今是拂去历史尘封让明代智书充分显露奇光异彩的时候了。

崇智思想的演进

晚明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时代。《智囊》诸书集中

NAH 5 6/03

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而将古代崇智思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是东方智慧的渊藪,中华灿烂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智慧宝库,5000年文明史曾产生过无数“智囊”、“智海”、“智多星”式的人物。崇尚智慧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中国老百姓十分喜爱足智多谋的人物,对于姜尚、张良、诸葛亮、徐懋功、吴用、刘基等智者总是津津乐道,此类民间传说流传很广。历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司法家、理财家等,在处理军国大事的实践中,无一不重视运用谋略。思想家、学问家对智慧的价值评议存在分歧,或推扬,或疑虑,或贬抑。先秦以来的兵家最重智谋,“谋攻”是《孙子兵法》的基本战略原则。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着重讲法术势,并要求重用“智术之士”。儒家创始人孔子每以“仁”、“智”并举,亦不废权变,认为既能坚守礼义,又能通权达变的人,才值得称道;若“可与立,未可与权”,则有欠缺。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也肯定权变:“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若死守中正之道而不达权变,就会执于一端,陷于片面僵化,结果反而有损中道以至废弃百事,即所谓“贼道”、“举一而废百”。汉魏之际著名学者文士徐干诠释孔孟观点说:“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中论上·智行》)这一解说基本符合孔孟精神。汉代崇智的学者,以司马迁最为突出。他好奇尚智,欣赏机智善辩的人物和谈言微中的滑稽之徒,尤其赞赏善用奇计安邦定国的谋臣良将,如晏婴、孙武、孙臆、蔺相如、张良、陈平等。他在《史记》中称颂蔺相如“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赞扬陈平“常出奇计,救纠纷之难,振国家之患”。对那些运用纵横捭阖之术以博取功名富贵的智辩之士,如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之辈,于史笔中虽深含讥贬,但未抹煞其智略与辩才。既批评苏、张之流乃是“倾危之士”,又指出“其智有过人者”。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特重“独行之君子”,兼取才智之士,能超乎世俗之见,不因德行有亏而并弃才智,表现了这位史学巨匠的卓识。西汉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重智谋,曾杂采儒、墨、名、

法诸家及各种传说,而成《说苑》一书,其中《权谋》一篇汇集先秦时代许多智谋故事。魏晋时期,学者裁量人物,类取智略。刘邵甚推“思通道化,策谋奇妙”的“术家”,以为其人可担当“三孤之任”;(刘昫注:“掌以庙谟,佐公论正。”)又认为杰出人才都兼有“英之智”、“雄之胆”两种素质;“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故能成大业”。(《人物志》)降及唐宋,崇尚智慧的言论也屡见载籍。唐人张弧说:“履智而能虚,则祸患弗可及也。”又指出智慧常用常新,不用则停滞:“水流不止,智用无滞。”(《素履子》卷中《履智》)北宋名臣张咏以多谋善断著称,也有类似的言论:“大小之事,皆须用智,智犹水也,不流则腐。”(《藏书》卷二一)推崇足智多谋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讲究用智以成事,一句话,崇尚智慧,这的确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条绚丽夺目的光带,不论是通俗文化抑或精英文化,都存在这种文化取向。这是事情的主导方面。

但也应当看到,传统思想观念也掺杂着畏智、忌智、黜智的成份。儒家作为汉代以后的学术思想主流派,其价值系统以伦理为核心,带有重德轻智的偏向。孔孟虽以仁智并举,但并非等量齐观,而以仁高于智,智从属于仁。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是二者弗去是也。”这里已隐伏着以仁义消解智慧,以道德吞并认知的危机。道家思想以自然为本位,以为聪明智慧、人力机械反乎自然,是造成社会混乱、人类罪恶的根源。老子说:“智惠出,有大伪。”庄子说:“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好知。”他们反对开发智力,因为“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七窍灵通,智火迸射,会导致人类素朴本性的丧失,社会于是大乱。他们主张“绝圣弃智”,使人们保持无知无识的“浑沌”状态,使社会退回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即原始愚昧时代。孔、孟、老、庄都是大智大慧之人,可是他们的思想学说却有轻智弃智的弊病。在儒学日渐显隆的时代,有些孔孟信徒的重德轻智观念较其“先师”还要严重。唐初名将李靖曾问儒者王通:“任智如何?”

答道：“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文中子·天地》）孔孟以仁兼智，二者可以相容，并行不悖。王通则认为纯任智慧就会“背仁”，仁与智是根本对立的，不管是谁，任智就会成为乱臣贼子。不过像王通这种畏忌智慧的独断言论，在唐代很少见，更未形成气候。到了宋元理学盛行时期，重德轻智的思想渐渐流行开来。二程和朱熹在并提仁智或仁义礼智时，都以仁为本，以仁为先，又以仁兼智，以仁包智。程颐说：“仁可兼知，而知不可兼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朱熹说：“圣人亦只教人求仁，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其所谓智，非泛指一切智慧、认知，而专指对仁的体认，“智者，仁之分别”。（《朱子语类》卷六）程、朱对智谋和权变是完全摈弃的，不令占分寸之地。程颐指斥汉代统治者“专以智力持世”，有悖“先王之道”。又讽刺汉代学者曲解经义，使世儒不明“权”字的真义：“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四书集注》卷五引程子语）他认为权就是经，经就是权，实质上取消权，不给权变、权术一点地盘。他这样讲，恰恰曲解了经文，而汉儒诠释倒是符合孔孟本旨的。朱熹也排斥智谋，他对张良、陈平等智谋名臣颇多微词，谓其学术全习黄老，专讲“从衡诡谲”之术。又批评贾谊和司马迁学问“驳杂”，偏重“权谋功利”。孔孟以仁兼智，尚能容纳智谋、权变，程朱以为“智谋”与“天理”水火不能相容；讲智谋就会背离“圣贤之道”、“先王之道”，这观念不是落后于孔孟了吗？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崇天理、黜智慧的观念得到加强，这对古来崇智思想的发展，对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都非常不利。

明代后期，思想文化出现新变。这是一个情窦大开、智火迸发、奇巧百出的时代。其时程朱理学已趋衰弱，崇尚智巧的思想却很盛行，形成一股清新活泼的潮流。智书的作者受此潮流浸润，继承和发扬崇智的文化传统，扬弃轻智黜智的文化心理，热情赞颂智

慧的可贵,深入探究智慧的奥秘,对业已形成的崇智新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对智慧的尊崇和推扬,超迈前人,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智书作者认识到,智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认知能力,“智者知也”。通常多指高品位的认知,具有全面性、深刻性、敏锐性、预见性、创造性诸特点,见微而知著,察萌而见大,量近而图远,如此等等。《智品》以“神品”为上。何谓神品?署名“日慎居士”者云:“神品者,机将萌而先知,祸未发而先睹。”(《智品·漫记》)冯梦龙也重“知微”、“远犹”、“洞彻八海”的智慧。智慧的内涵不仅指洞察力、预见力等,还包括随机而动的应变能力,察见事物的萌芽、先兆,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而能应付裕如,立于不败之地。冯梦龙说:“其斡旋入于无声无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思思索之外。”(《智囊·上智部总序》)所谓“斡旋”,所谓“举动”,均指行动而言。《经世奇谋》将察见隐患而未雨绸缪的“备患类”列于全书之首,以显地位的重要。其书“纾祸”、“应猝”、“拯危”、“用间”、“饵敌”之类,《智囊》中“经务”、“诘奸”、“权奇”、“灵变”、“制胜”之类,都侧重讲智慧的运用。依照明人的见解,智慧的内涵应包含知与行两个方面,而在实践中运用智慧尤其重要。

那么,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智慧的发展取决于什么呢?冯梦龙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则为焦土,人无智则为行尸。”(《智囊自叙》)智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灵性知性,一种天赋潜质,人有智就同泥土含有水分一样。智慧虽说是天生就有的,但它的生长发展全靠后天的学习、磨炼。还是冯梦龙说得好:“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只有通过学习,智慧之水才会从性地中汨汨涌流而出。与冯梦龙同时的公安名士袁中道也认为智慧生长于“淬砺磨炼”,“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逼极而通,而智慧生焉”。(《珂雪斋集》卷一〇)早在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就对统帅徐达说过:“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续藏书》卷

三)此乃经验之谈,非常深刻。追根溯源,盖出于孟子:“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孟子·尽心上》)强调智慧的发展离不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又重视学习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智慧论的精髓,到明代又拓展深化了。

晚明智书作者论述智慧对人生、社会的宝贵价值和重大意义,透彻充分,推尊之至。在他们看来,人为万物之灵,灵智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性,蠢蠢然无智无识则与动物无异。人而无智就失去生命的光辉,有如行尸走肉,在天壤间寸步难行,甚至陷于灭顶之灾。冯梦龙的友人张明弼把智慧比作照耀万物的日光、月光、火光,人无智光烛照就只能在黑暗中探索,非常危险。他在《智囊叙》中说:“无智之士,如走落日、死月、熄灭之下,摘埴索涂,或触其颈,或蹶其踵,不戒而堕于深堑,则毕其命而已矣!”他们特别强调智慧对于国家民族命运至关重要,其书选材、论评也侧重于此,而这恰恰是为一般儒者所忽略轻视的。李贽察见,正统的政治观、历史观大都取重“节义”、“悃谨”之士,而轻“智谋”之士,而他的看法却相反,认为智谋之士最可贵,而后才是节义之士,悃谨之士为下。对三种人的社会历史作用也应当作这样的评价。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兴盛是由于重用智谋之士。秦之兴,“六国之谋臣尽走咸阳”;汉之兴,“陈平之谋居多,平非唯有定天下之勋,亦且有安社稷之烈”;可见“创业中兴之主所用所养”都注重智谋之士。国家败亡则由于智谋之士不获重用,“而后正直之臣见,节义之行始显耳”。但到这时,国家已经败亡,节义之士对于国家又有“何益”、“奚赖”?“若夫悃厚清谨,士之自好者亦能为之,以之保身虽有余,以之待天下国家缓急之用则不足,是亦不足贵矣”。(以上见《藏书·智谋名臣论》)李贽论智察人带有浓厚的实用功利色彩,着眼点全在强国利民,有益于“天下国家缓急之用”,一扫腐儒高谈阔论。《智品》编者樊玉衡的观点和李贽一样,也认为统治层的智和愚关系着国家的盛和衰。於伦在《智品序》中申述编者本旨说:“以为天

下事无不济于智者。智之用，在天如日，在人如目，无学无术，而以人之国侥幸，何异瞽者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乎？”对晚明人的这一新颖卓异的历史观、政治观，冯梦龙在《智囊自叙》中作了精到的概括：“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桀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纵观历朝统治，智则兴，愚则亡，智则盛，愚则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皆系于智或愚。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是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政治学说史上的崭新卓特之见，充分体现了晚明人对智慧的高度重视和极度推崇。

智书作者非常器重人才，对各种人才又最重智者。李贽以八种事物比拟八类人才，八物之中以日月亦即智者为最可贵。因为智者能包容、发挥八物之所长，“夫智如日月，皎若星辰，照见大地，物物赋成”，“此一物，实用八物，要以此物为最也”。（《焚书》卷四）李贽等分析、评价人物的各种素质，也以智为贵，以智为先。孔子以智仁勇三者并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中庸》以此三者为“天下之达德”。无庸置疑，儒家是以仁置于主导的中心地位。李贽对智仁勇赋予新的含意，认为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三者之中，智识是根本，也最可贵。“是才与胆皆因识而后充者也”，“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焚书》卷四）历代兵家曾对将才提出各种条件，宋代名将岳飞标示五项，即仁智信勇严，以仁居先。冯梦龙认为，应当把智提到首位，“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惟智者具有真知远识，能透彻理解区分仁与不仁、信与不信等，能真正在战争中贯彻仁信勇严，从而赢得胜利。反之，无知无识，不善变通，拘泥于仁信勇严，都可能导致失败。宋襄公与楚人交战，讲究蠢猪式的仁义，结果大败，还有其他死守仁信勇严的战例而遭致失败的战例，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以上见《智囊·兵智部总叙》）两军相争，

成败关键在于智或愚,知或不知。将才最重要的素质是智,为将之道首重善于用智。

智书的作者大力阐扬智慧的真谛和功用,要使世人明白智慧非但不可怕,而且可宝可贵可珍可爱,因而有助于驱散畏忌智慧的社会心理迷雾,这在当时起到了破愚导智的思想启蒙作用,意义深远。

晚明智书的思想特色

晚明人对智慧的许多问题,诸如智慧的内涵和功用,智慧的类型和等级,用智的动机和效果,智和愚的关系等,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其间精思妙论随处可见,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古代智慧论。纵观其思想旨趣、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致用性。晚明学者编纂智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经世致用,旨在借鉴古今用智经验,启发和激活世人的心智,冀望各级统治者能大胆重用才智之士,充分发挥大家的智能,以济时艰,强国利民。鉴于明代后期江河日下的衰颓形势,志士仁人忧心如焚,用心寻求救世方略,总结治世经验,于是以“经世”冠名的著作纷纷问世,如万廷言《经世要略》、冯应京《经世实用编》、陈仁锡《经世八编类纂》、张燧《经世挈要》等,明末陈子龙《明经世文编》集其大成,也最有名。与上述著作出现于同一时代的智书,也是一种经世之书,是从用智的角度讲述经世济民之术的。俞琳将自己的著作径直取名《经世奇谋》,用意最清楚不过:运用“奇谋”,是为了“经世”。柴寅宾在此书序言中指出,读后令人“识为之开,智为之浚,胆为之振,而机为之遇”,“斯诚筹画之津梁,而善用于家国天下者之司南也”,“为经世之不可少者”。王受人在书末跋语中也说:“集中辅国治民之术,无所不载,纬武经文,略无所不搜。”王家振在《益智编序》中也明确指出,此书“本旨”在于“经世”与“实用”,书中所载“自

全君、翼储，以迄用人、理财、治兵、弭盗、筹边诸大政”，全是为了“举昔贤之谋猷，作后人之刑范，以庶几乎君上之采听”。《智囊发凡》（盖冯梦龙自撰）亦谓本书“有裨经世”，沈几《智囊叙》则谓“是书也，于以成天下之亹亹，非小补也”，而有“入世用世之概”。柴寅宾还特地提醒读者，不要将《经世奇谋》混同于“巷议街谈，荒词谍语，以至虚幻无当、迂疏鲜要之说”，智书不属于荒诞无稽的野史小说，以防误读。这许多言论确证，智书乃是地地道道的经世之书，实用之书。与一般经世政书不同之处在于，智书讲述军国大事皆以运用谋略为主线，它是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经世之书。而以擅长考据标榜的清儒却不见这个明摆着的事实，竟诋之为“佻薄”、“乖刺”，信口雌黄，一何至此！

智慧是人类独具的一种天赋潜能，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用智之人却有良莠，各自抱着不同的动机目的运用智慧，产生的社会效果大不一样，或有益于世，或有害于世。志士仁人用智，为国为民，乃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乱臣贼子用智，包藏祸心，一旦得逞，则祸国殃民。智如两面刃，能断物利人，也能杀生害人。张明弼为《智囊》作序，把智慧比作名剑干将莫邪：“夫干将莫邪，圣人以之断物，豪士以之立谨，贼夫以之抉人眼、屠人腹，贼夫手中之干莫，即圣人手中之干莫也。”干将莫邪乃天下利器，传世之宝，被强盗拿去杀人，这能怪罪干将莫邪吗？当然不能，“此用智者之罪，非智罪也”。应当把智与用智者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张岱辨此也甚明晰：“帝王之睿虑哲谋，与奸雄狡狴之机械变诈，实与同源，第视人用之何如耳。一饴也，伯夷见之，谓可以养老，盗跖见之，谓可以脂户枢。发念虽殊，其以应用自不同也。”（《琅函乞巧录自序》）他指出贤君哲谋与奸雄变诈同出一源，均属智谋范畴，但用途各异。饴糖的比喻与干将莫邪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昔之哲人见到小人奸人以阴谋诡计害人祸世，误将智慧与阴谋诡计划上等号，“以用智为戒”，乃至畏忌、排斥智慧。智书作者与评者将智与用智，贤

者为益世而用智与奸人为害世而用智严格区别开来,有助于消除忌智畏智的社会心理积淀,发挥智慧之潜光。同时也告诫人们不可滥用智慧,一切要以造福国家民众为指归,还要警惕识破恶人的阴谋伎俩。

鉴别用智动机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为公还是为私。为公就是为国家民众谋利益,为私就是追逐个人贪欲。秦汉学者已经提出这种区分。刘向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许。夫诈则乱,诚则平。”他还进一步指出,君子为公而谋,利国利民也利身,小人为私而谋,害国害民也害己:“是故尧之九臣诚,而能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降至后世,诈者当身而死。”(以上见《说苑》卷十三权谋)古代学者还认识到,公心与私心会影响认识能力,智之明暗。托名战国尸子者有云:“自井中视星,所见不过数星;自丘上以望,则见其始出也,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尸子》上)大公者胸怀远大,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可以成为大智大慧之人。小人为贪欲私利所蒙蔽,往往变成愚人蠢人。注重以贤载智,以公运智,也是中华智慧论之精要。明人对此多有阐发,冯梦龙昭示,用智的宗旨即在“造福于民”,“造福于国”。又告诫,出于损人利己之心,玩弄阴谋诡计,终究要败露,会黔驴技穷,无好下场,“无奸不破,无伪不穷”。李贽也明告:“吾又以知谲之无益,而奸之受祸也。”(《续焚书》卷二)此皆警世箴言,是对企图以权术诡诈达到卑鄙目的之人的棒喝。他们对心之公私与智之明暗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见解。冯梦龙指出,那些“老成远虑”的贤明大臣所以能机智妥善地处理各种棘手的政务,一个重要原因,“由中无寸私,不贪权势故也”。而贪鄙之人,权势欲、金钱欲熏心的官吏,干出各种蠢事,以至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则由于“为贪心所蔽,利令智昏”。他们博综各种史书,认

真探讨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又十分关心现实,目击种种社会现状,有清流,有浊物,正面的,反面的,心有所感,这才发出如此深切著明的议论。

其二,兼容性。春秋战国时期,有些思想家、谋略家指出,“明主”与“乱主”治国之术截然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明主能“因天下之智力”,故“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故“身劳而祸多”。(《管子》卷二〇)所谓“天下之智”,所指范围很广,按汉代刘向的看法,不仅指圣人贤相,上流贵族,还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要使“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刳莠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事举而无遗策失策”。(《说苑》卷一三)这一卓越的思想在明代后期大放光芒,增添了许多异彩。

晚明智书作者多为下层官吏和落魄寒士,与平民百姓接触较多,与市井才人艺匠关系密切,因而熟悉民情,知道在卑贱者之中不乏聪明才智之人,智慧并非属于少数高贵者的专利品。冯梦龙公然向“上智下愚”的传统权威观点挑战,发出惊世骇俗之论:“下下人有上上智”。经过冯梦龙等人的细检旁搜,许多出身低微卑贱而为历史偏见所埋没的聪明人,得以显露于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非常注意搜集历代智女才媛的材料,并单独编排立目,使妇女在智者行列中赫然占有一席之地。如《经世奇谋》有《智女类》,《智囊》有《闺智部》。作者一扫“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各种陈腐观念,对妇女的才智大唱赞歌。《经世奇谋·智女类》小序称“杰出闺阁”乃是“女中丈夫”,“其名馨彤管,而与天壤相敝”。《智囊·闺智部》赞美智女之词比比皆是。如称齐襄王后:“分明女中蔺相如。”刘太妃:“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赵括母:“不独知人,其论将处亦高。”陈婴母:“死生之际,能断决如此,女子中伟丈夫。”冼氏:“智勇俱足,女中大将。”崔简妻:“不唯自全,又能全人,此妇有胆有识。”又谓陈子仲、王霸之妻:“能广其夫志,使炎心顿冷,优游无患,丈夫远不逮矣。”谓崔敬之女、周凯

之母：“绝无一毫巾幗气，生男勿喜女勿悲。”更难得的是，能一视同仁对待不同阶层的妇女，对下层智女也啧啧赏叹。如赞柳氏之婢：“胸中志气，殆不可测，愧杀王浚仲一辈人。”邹仆之妻：“生于下贱，何曾读书知礼义，而临变不乱，处分绰如，世之自命读书知礼义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又称某商人之女谢小娥：“其智勇或有之，其坚忍处，万万难及！”如许热情洋溢赞美之词直令天下妇女扬眉吐气，而使须眉为之汗颜。那时文坛杰士如李贽、屠隆、汤显祖、袁宏道、潘之恒、钟惺、谭元春、张岱等，也都热情赞美妇女的才智，小说和戏曲塑造了一系列聪颖过人的妇女形象，这些与智书合在一起，特出地反映了晚明时代的崇智精神和对智慧博采兼收的态度。

智书作者具有海涵百川的胸怀，既重视大智大慧，也不弃小智小慧。智慧不论大小，只要有益于世，都开怀接纳。《智品》一书，首推“神品”，继以“妙品”，但不轻视品第靠后的“具品”。樊玉衡有评语说：“具者备也，言备一时之用，不可少也。”（《智品》卷一〇）具品不算大智慧，或许微不足道，临到急用时却能发挥作用，所以应当收之以备用，而不可弃之。孔子瞧不起才智量浅的人，尝云：“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樊玉衡不以为然，认为斗筭之才也不可弃，“斗也必有斗之用”，“筭也必有筭之用”，“故尺寸之长，袼线之伎，皆得致用，而后天下无弃才”，“然则斗筭之人不足算也，而足收也，岂可忽诸？”（《智品》卷一〇）其友於伦作《智品序》也认定“具品”不可弃，虽至贱如瓦砾也有一定用处，“夫取瓦砾窒穴，取狸狌捕鼠，斯亦世之不可少者”。在特定场合和关键时刻则小智短才兴许能派大用场，起大作用。冯梦龙批评“俗儒”讥笑孟尝君田文收罗鸡鸣狗盗之徒，殊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因材施教，盗皆作使”，有何不可？结论是，“天下无弃才”，“天下无废人”。（《智囊》卷一）关键要看善用不善用。智书取材侧重军国大事，也杂收琐细之事，如灯谜、拆字、巧对、笑谈、谐谑等，皆属杂智